

十五年驻外记者生涯

王 殊

新 华 出 版 社

十五年驻外记者生涯

王 殊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12,000 字

1988 年 6 月第一版 1988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500 册

ISBN 7-5011-0167-1/K·32

统一书号: 11203·096 定价: 1.80 元

目 录

驻国外记者的第一课.....	1
在开城的日子.....	10
编辑部的工作.....	18
第一次出国.....	28
红海之滨.....	38
卡拉奇的朋友们.....	45
到非洲去.....	54
非洲暴风雨.....	65
北非行程.....	74
另一条道路.....	83
三访巴马科.....	90
难忘的一个月.....	99
一次冒险的采访.....	108
“小人国”和“大人国”.....	119
加勒比海危机.....	127
赤道风光.....	137

铜矿王国的危机	145
两周内看一个大国	152
参加营救工作	159
毛主席、周总理对驻外记者的关怀和鼓励	165

驻国外记者的第一课

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二年之间，我担任了将近十五年新华社驻国外记者的工作，在亚洲、非洲、南美、西欧的许多国家里工作过。到现在，我离开新华社已十多年，仍然感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也很有趣味。这个工作使我有机会见识了世界上许多的地方，经历了不少的历史事件，从而增加了很多的知识，得到了不少的锻炼。可是，我是在一个比较偶然的时机中担任了这个工作的，事先并没有受过驻国外记者所必需的训练，也缺乏国际问题的起码的知识，因此到国外以后，遇到了成堆的困难，经历过许多次失败。只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摸索练习，积累经验，才逐步掌握了驻国外记者某些必要的业务知识，学会了做这个工作。当时，全国解放还不久，需要立刻建立一批新的国外分社，因此挑选了一些同志到国外去当记者。其中大部分同志只有一些国内采访的经验，还有一部分刚刚从其他工作岗位调来，不可能象后来那样，让准备做驻外记者工作的同志到大学或外校去学习外文，并且在编辑部里进行实习，而只能到国外以后在工

作中提高自己，学会做记者工作。当然，我在国外工作中不断有了进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花了很多的力气，走过不少不必要的弯路，至今仍然深感自己当时作为驻外记者所应有的基础训练的不足。我觉得，新华社国际报道质量的改进，自然要取决于许多方面，而最重要的是驻外记者水平的提高。驻外记者在派出之前，应有一定的时间接受严格的基础训练，而且在国外工作若干年以后，还要回来进一步提高。驻外记者的政治品质是很重要的，而业务、外文、知识、对外活动的严格要求也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说起来也很有趣，我作为驻外记者的第一课不是在大学的教室里、编辑部里上的，而是在朝鲜前线的战场上学的。我在一九四八年十月，调到新华社驻第三野战军总分社工作。由于当时战争环境很紧张，只进了为时一个月的记者训练班，就到前方去采访。此后做了三年的军事记者，但由于多数时间在编辑部工作，采访经验很少。一九五一年九月底，我同戴煌、姜庆肇两位同志奉总社的指示，从南京调到朝鲜前线的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去。我们在北京愉快地度过了第三个国庆节以后，在十月底就出发到朝鲜前线。在丹东等了五天后，搭上了志愿军政治部一辆运送军服的卡车。那时志愿军入朝作战已一周年，战争在三八线附近激烈地进行。年青的志愿军空军还刚刚参战，敌机的轰炸封锁白天晚上都很猖獗。我们的卡车在下午五时薄暮时分渡过鸭绿江大桥。大桥的一半已经炸坏，只有一半通行。桥的两边都是密集的高射炮阵地，许多炮口瞄准着天空。这几个月来敌机

想尽办法要把大桥完全破坏，都被我高射炮兵打得粉身碎骨或逃之夭夭了。在全国解放后，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看到战争的雄壮情景了。当跨过这条充满了战斗气氛的大桥时，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不自觉地唱起了志愿军的战歌。

车子过了新义州，天色黑了下来。还只是十一月初，入夜气候已很寒冷，我们穿着棉大衣还感到很冷。我们在路上要经过五道敌机的封锁线，其中最厉害的是清川江大桥的封锁线。那时公路两旁都已部署了防空哨，只要敌机一来就朝天开枪，警告车辆立即熄灯前进。所以敌机来的次数很多，也扔了不少的照明弹，但一路上我们很顺利，到清川江大桥时还不到半夜。大桥早已炸毁，搭了一条并不太宽的浮桥。敌机曾许多次把它炸断过，可是几小时以后又恢复通车了。由于来往车辆很多，两边桥头都有哨兵指挥交通，把车辆编成几个小队。敌机一飞走，车子就一辆跟一辆疾驶过浮桥去。那个晚上，敌机不断来袭，无数探照灯的光柱把天空照得通亮，高射炮一串串红绿色的炮弹在空中爆炸，敌机投下的炸弹也在周围爆炸，在江面上冲起了一个个水柱，震撼得大地不断地抖动。我们隐蔽在离大桥一公里多的小山边上，观看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战斗。到凌晨二时多，敌机在遭到了很大损失后才飞走，我们就抓紧时机渡过了大桥。走了一阵，卡车进入山区，天就下起大雨来了，我们穿的棉大衣很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但敌机也不来了，车子打开大灯加快速度前进。临近拂晓时，司机已经十分困乏，路面也很泥泞，卡车在山口上拐弯的时候一不小心溜到了崖边，急忙煞

住，车头已伸到了崖外。我们赶忙都跳下了车，看到伸在崖上的车头和很深的山谷，互相庆幸好运气。就在一个多月前，有一个记者同志也是在去志愿军总分社的路上，由于卡车在敌机袭击时翻了车而不幸牺牲。司机已不敢上车把车子倒回来，最后请一辆过路的大卡车用绳索把车子拉了回来。我们继续前进时，天已大亮，大家个个都象落汤鸡一样被完全淋湿了。

志愿军总分社驻扎在志愿军总部附近一个山头上，这是个已经开挖过的金矿的洞子，包括编辑、记者等一共有十多个人，工作和生活都很艰苦。我们在洞子里休息了两天后，社长普金同志给我们分配了工作。戴煌和姜庆肇同志都去前方；可能由于我过去学过一些英文，却要我到鸭绿江边上的小镇碧潼的美俘营去。当时我很想去前方。普金同志一再说服我，但也答应过一些时候再把我调到前方去。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去，从此就走上了长期从事国际报道的道路。过了几天，我就搭乘战俘营的小吉普车前去。一路上都是小路，夜晚敌机甚少，路过一个温泉还洗了一个澡，到目的地时天刚刚有些亮。美俘营在鸭绿江边起伏不平的山坡上，江的对面就是我们的祖国，从已经封冻的江面上走过去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到。美俘营大约有一千多名战俘，编成了五个连队，分别住在山坡上几个居民已经全部撤走的小村子里。志愿军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政策，战俘都穿着蓝布棉衣裤，伙食也给予优待，在村子里可以自由走动。战俘营周围，除了少数几个志愿军的岗亭外，看不到一点警戒森严的

样子。

我过去在解放战争中采访过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有过一些经验，而这一次是美国战俘，情况几乎完全不同。首先是语言的隔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过英文，可是已多年没有碰过，谈得深一些就感到十分吃力，很难运用自如。另外，采访外国战俘也有不少困难。有些战俘受反动宣传的毒害甚深，甚至还很傲慢，不愿意谈；有些思想顾虑很大，勉强谈一些，也未必真实；也有些出于各种原因，很愿意谈，但也不一定实在。因此要对他们做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也要摆各种事实，揭穿他们一些似是而非的谬论。我对美国各个方面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件事做起来就很费力。同时，有关战俘的报道当然国内报刊也需要，而在更大程度上是要进行国际宣传斗争，特别是揭露美国宣传机器诬蔑我志愿军虐待战俘的谎言。因此，对国际局势尤其是敌人的宣传动向要十分熟悉，也要善于掌握国际报道的方式方法，这对我就困难更大。我在工作中常常费了很大的劲，但收集到的材料不生动、不典型，写起来很困难。有时即使有些素材还不错，可是又写得干巴巴的，针对性不强，连自己读起来也感到乏味。所以，我在战俘营所作的报道，特别是开始时，几乎是完全失败的。有些稿件总分社和总社没有采用，有些即使采用了，看来也甚为勉强。

在工作中发生困难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气馁和苦恼，对担任这个工作多次发生过怀疑和动摇，想写信给总分社要求调到前方去。后来，我自己也知道这种想法并不现实，不得

不冷静下来考虑以后究竟如何办。我深切感到，要承担这个新的任务，只有刻苦努力，一切从头学起才行。所以，困难并不是坏事，可以使人长进，找出解决的办法。我许多年来从没有象现在这样用功过，每天抓紧时间听外国的广播，读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看外文书刊，研究敌人的宣传动向。只要有一些空，就阅读战俘营所存有的国际时事、世界历史、国际法律、名人传记之类的书籍，增进自己的知识，甚至找时间读一些外国的文艺作品。管理战俘的干部和翻译有些是在美国上过学和工作过的，还有很多同志英文很好，知识也丰富。我就向他们虚心讨教，请他们帮助，讲解英文学习中的疑难之处。同时，我也利用采访的机会，同战俘聊天，听他们谈过去的经历、家乡的生活、国内的问题，乃至家庭的琐事。过了不久，我对国际局势和美国社会生活有了不少的了解，外文的熟练程度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报道工作也有了起色。个别的稿件还受到了总社和总分社的表扬，使我对从事这个工作增强了信心。可惜我在战俘营只工作了半年多，总分社来信要我立刻赶到开城去采访朝鲜停战谈判。因为驻在那里的一个记者要轮换回国，而去接替他的一个记者又在快到开城时翻车牺牲了。我原来是不愿意到战俘营来采访的，但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和学习以后，心情却发生了变化。当小吉普车驶过快要开冻的鸭绿江回首望到那些山坡上的小村子时，我倒感到有些依依不舍了。

在我回总分社的前几天，志愿军部队抓住了几个美蒋空降特务。经审讯证实，他们是美国侵略军空投到志愿军后方

来了解细菌战效果的。几个月来，被打得狼狈不堪的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严重违反国际公约的细菌战。但朝中部队和朝鲜人民广泛开展了卫生防疫运动，美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又遭到了失败。他们派来的这些空降特务不但没有给他们打听到什么，反而成了揭露他们罪行的铁证。后来，在对这些特务的审讯中又进一步发现：这些特务多数是被美伪军俘获后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在战俘营里帮助美蒋特务迫害中朝战俘的叛徒。因而，他们也是美蒋特务企图利用残暴手段扣留志愿军战俘的阴谋的参与者。总分社了解这个情况后，立即要我前去采访，配合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揭露和反对美方企图扣留朝中战俘阴谋的斗争。当时，停战谈判已进入第四项议程，即遣返战俘的问题。美方在谈判桌上谎称朝中战俘“拒绝遣返”，要求实行什么“自由遣返”。而在战俘营里美方却指挥蒋帮特务对志愿军战俘施用种种残暴手段，胁迫他们“拒绝遣返”，以便把他们劫持到台湾去。朝中代表义正辞严地揭露了美方的罪恶行径，为维护国际法准则和战俘的遣返权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些曾参与美帝国主义阴谋的空降特务的捕获，当然引起了志愿军和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领导人的重视。

当时，有些特务已被押解到志愿军总部，还有些仍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我立刻到各个部队去采访。有一次同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高淳成同志赶到人民军部队去，路上敌机封锁袭击很频繁，司机一慌张就翻了车。幸亏路边是很浅的麦田，人没有伤，车子也没有坏，请一辆大卡车帮忙用

绳索把车子拉了上来。我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空降特务多数是在志愿军参战初期极为艰苦的战斗中被美伪军俘虏的，后来被关押在朝鲜南部海中巨济岛上的战俘营里。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们背叛了祖国，并且参与了美蒋特务迫害和扣留战俘的罪行。以后，美蒋特务机关又选上他们，专门进行了包括跳伞在内的各种特务训练，准备空投到朝中部队后方来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细菌战开始之后，他们被陆续派来打听细菌战的效果。这些特务有些是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劳的，也有些渐渐地感到上了敌人的当，有了悔改之意的。因此有几个空降特务落地后立即自动向志愿军部队缴械投降，其中有一个在跳伞之前的一刹那拉响几颗手榴弹扔在机舱里，炸毁了飞机，美机驾驶人员也被我志愿军部队捕获。在我采访的时候，这些特务都很害怕和紧张，特别是不敢多谈在巨济岛战俘营里帮助美蒋特务胁迫我战俘“拒绝遣返”的情况。我和志愿军管理战俘的人员反复向他们宣讲政策，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终于他们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美蒋特务强迫扣留志愿军战俘的罪行。他们在战俘营里施用威胁利诱手段，要战俘“拒绝遣返”，“到台湾去”，如果不干，就进行酷刑拷打，甚至把战俘打昏打伤后，强使他们在“拒绝遣返”的“请愿书”上盖血印，在身上刺“拒绝遣返”的字样。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尖锐地戳穿了美方谈判代表所谓“自由遣返”的伪善言词。

我收集到了大量具体生动的材料后，立刻回到总分社去。由于这次报道的目的很明确，而且有了前一段战俘营报

道的经验教训，我在二、三天内就写出了两篇揭露美国所谓战俘“自由遣返”的骗局的通讯。这些报道的针对性和战斗性都较强，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在国内外引起了重视，及时配合了朝中方面在板门店的谈判斗争。在我完成这一任务准备去开城的前几天，总分社的秘书高向明同志给我看了毛主席写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和开城谈判代表团团长李克农同志的一份电报，说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提供了美蒋特务罪行的种种事实，要求谈判代表团利用这些事实揭露美方扣留战俘的阴谋。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国际宣传斗争的重要性，也加强了我努力学习、掌握国际报道艺术的决心。

我完成了这一报道任务后就离开总分社到开城去，在动身的当天，忽然听到了记者刘鸣同志在美机一次空袭中不幸牺牲的消息。刘鸣同志是我在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工作时的老战友，他到朝鲜前线还只有两个多月，才写了第一篇战斗通讯。当时他正在山坡上的防空洞里写稿，不料美机的一颗炸弹正好炸中了洞顶。抢救的同志把炸毁了洞子挖开以后，他已伏在桌子上牺牲了，鲜血染红了摊在面前的稿纸。我们不少优秀的同志在朝鲜前线为了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献出了自己年青宝贵的生命。有些是我熟悉的，至今我还能记起他们的音容；也有些我从来没有见过一面，但也仍记得他们英雄的事迹。我们永远怀念他们，向他们学习。

在开城的日子

我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到开城的时候，朝鲜停战谈判正由于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争执不下而陷于时续时断的僵局。侵朝美军司令部虽遭到了春季攻势的失败，但仍不甘心，还在准备新的攻势，妄图用军事解决问题。美方代表在板门店谈判桌上公开进行军事恫吓，叫嚷什么“要让大炮来进行辩论”。朝中代表严正指出，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也不可能战场上取得，只要你们有本事，就请来吧！美国侵略军在板门店谈判区两侧不断发动军事挑衅，甚至对板门店谈判区和开城中立区进行轰炸、炮击，施加军事压力。我志愿军部队进行了猛烈的还击。我到开城以后不几天，志愿军炮兵部队对美军阵地展开了整夜的炮击，打得天际一片通红，连我们住所的窗户纸全都震破了。战争初期美国侵略军欺负我志愿军缺乏炮兵和空军的强大支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到开城后第二天，我就去板门店采访了美军炮击谈判区的事件。自停战谈判陷于僵局以来，美军炮击轰炸谈判区和中立区的事件不断增加，而美方代表对朝中方面提出的进行

联合调查的要求却制造各种借口竭力拖延和拒绝。但这一次是好几发炮弹打到了进行停战谈判的会场附近，美方没法推脱，只好同意联合调查。板门店是在平壤到汉城的公路上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几间破草房，但正好处在朝中军队和侵朝美军的军事分界线上，所以双方同意把这个小村子作为谈判的地点。从此这个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地方，就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了。在谈判开始时，双方还划定了板门店谈判区以及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的驻地开城和美方谈判代表团的驻地汶山两个中立区，并保证不对这些地区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以利谈判的进行。从开城到板门店只有二十多公里的路，我乘吉普车大约半小时就到了。军事分界线在板门店中间通过，一边由美军宪兵站岗，另一边由朝鲜人民军战士站岗，两边都搭有几个帐篷，供双方代表在谈判前后休息和举行记者招待会之用。进行谈判的小房子就修建在公路一侧的军事分界线上，双方代表从各自一侧的大门走进谈判厅，坐在同样跨在分界线上的谈判桌的各自一边。这个小房子是不久前新修的，原来用的是一个大帐篷，地方较为狭窄，光线也很暗淡，特别是冬季温度很低，看来这个谈判还会拖延下去，因此作了这样的改建。公路另一侧是几间破草房，居民已全部撤走，双方记者常常聚集在这些破草房前面的场地上，等候双方新闻官在谈判休会后发布消息。在谈判刚开始时，西方记者有一百多人，朝中方面也有三十多人，双方记者在等待的时候常常互相打听一些情况，谈谈各自的看法，当然意见极为分歧，时常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乃至吵得面红耳赤。

现在，谈判时常陷于无限期休会，到板门店来的西方记者也已寥寥无几了。我同朝鲜中央通讯社的记者高淳成同志在场地地上转了一圈，同少数几个西方记者随便搭讪了几句。他们对联合调查炮击谈判区的事一点不感兴趣，不象过去那样一看到就走上来问这问那了。

破坏谈判区和中立区协议的问题，是属于双方联络官的事。不一会，朝中方面的联络官带着几个参谋和翻译乘着吉普车来到了板门店。他们在帐篷里休息了几分钟后，就按时走进谈判厅去与对方的联络官会面。只谈了二十多分钟，美方联络官由于证据确凿，难于抵赖，就不得不同意立即对这一事件进行联合调查。我同其他记者一起跟着双方联络人员走到了离谈判房子只有一百多公尺远的现场。在前天下午三、四时，好几颗美军的炮弹打到了这里，把房子的许多玻璃都震碎了。双方人员察看了几个大约二十多公尺宽、近十公尺深的弹坑，并且验看了从弹坑里捡出来的炮弹碎片。美方联络官不得不承认是美军打来的炮弹，但仍竭力辩解说这是无意造成的事故。朝中方面联络官列举各种事实指出这是美方制造的一系列军事挑衅中的一部分，企图对朝中方面进行军事讹诈。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双方回去报告自己的代表。这是我到开城后的第一次采访，调查结束后就赶回到开城去写消息。美军挑衅事件这几个月来已司空见惯，我的前任已写了不少这样的消息，而对我一个新手来说，仍是非常吃力。写得要结合当前谈判的形势，又不能照抄老一套，而且根据规定，这种简单的消息要在半小时内写好送

审发回北京。我汗流浹背地写了一个多小时才写好，自己看了还不太满意。最后经过新闻处的同志做了不少的修改才发了出去。到开城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我深深感到又一个相当困难而需要努力学习的工作开始了。

在谈判开始之初，中国记者人数不少，后来谈判出现拖延的局面，许多记者就陆续回国去了。到我去的时候，实际上只有我一个记者，两个摄影记者和两个新闻摄影师。代表团新闻处也只有处长沈建图同志和他的一个助手段连城同志。沈建图同志当时是国际新闻局的局长，后来新闻局并入新华社，他就担任了对外新闻编辑部的主任。他在停战谈判一开始就随代表团来到了开城，一直坚持到谈判结束后才回到国内。他出生在一个华侨的家庭，当过英文报刊的记者。抗日战争初期他到延安后一直从事英文广播的工作，对国际宣传很有经验，英文也很好。他在谈判期间以“吴敏”的笔名用英文写了许多出色的评论，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特别是他的文章尖锐有力，论证严密清晰，文风也生动活泼，现在年纪大一些的同志当还清楚地记得。他的这些显著的成绩，都是同他严谨、刻苦的工作作风和敏锐、熟练的业务能力分不开的。他事事亲自动手，从阅读西方通讯社的消息，收听西方的广播，研究敌方的宣传动向，审发中外记者的稿件，一直到自己撰写主要的评论和消息。每次谈判结束，他向中外记者宣布谈判的情况以后，立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专心和紧张地坐在打字机前用英文撰写评论。一篇一千五百字左右的评论一般只要一、二个小时就可写成。他对年轻的和没